

一山之隔：法国与西班牙

为什么相邻的两个拉丁大国，活成了两种欧洲

王建硕

费曼式写法 ·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

导读

为什么相邻的两个拉丁大国，活成了两种欧洲

先别翻历史书

先做个小实验。找两个分别去过法国和西班牙的朋友，各问一句：「那边怎么样？」

去法国的大概率说：美、讲究、什么都精致，但有点端着，巴黎人不太好惹。去西班牙的大概率说：热、松弛、半夜街上全是人，但好像有点乱，商店下午还关门。

奇怪的地方来了：这两个国家**挨着**。语言同祖（都是拉丁语变的）、宗教同款（都是老牌天主教）、历史上互娶互嫁了几百年，中间只隔一道不算高的比利牛斯山。按道理，它们该像湖南和湖北那样，差异有，但同大于异。可实际感受却是欧洲差别最大的一对邻居——连晚饭时间都差着两个半小时。

这本书就是想弄清楚：**这种差异是哪儿来的？**

答案是：不是性格，是层积。法国和西班牙的差异，像地质剖面一样，是一层一层叠出来的——最底下是地理（一道山、一块高原，隔出了「连通」与「隔离」两种命运），往上是罗马人留下的共同地基，再往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「建国工艺」（西班牙是拼图拼出来的，法国是锻打锻出来的），然后是集权的两种姿势、语言的两种政策、时钟的两次拨动。每一层都不厚，叠起来就是今天你在街上感受到的全部差别。

所以这本书的读法是剥洋葱，一层一个问题：

- 地理：一道不高的山，凭什么隔出两种欧洲？
- 历史：拼图拼出来的国家和锻打出来的国家，长大后哪里不一样？
- 制度：为什么法国只剩一种语言，西班牙却供着四种？为什么西班牙的钟被拨错了八十年？
- 文化：石头和画布是怎么把这一切记下来的？
- 今天：高铁网、自治区、内战的记忆，还有——到底谁的日子更舒服？

每一章都能独立读，从中间翻进来也不会迷路。但按顺序读，你会发现一个总开关：理解了「拼图」与「锻造」这两种建国工艺，后面所有的差异——从加泰罗尼亚公投到九点半的晚饭——都会自己各就各位。

翻开第一章吧。我们从那道山开始。

第一章 · 一道不高的山

一座山能隔出多少东西

打开欧洲地图，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只隔着一条比利牛斯山——从比斯开湾到地中海、长约四百三十公里的山脉。它的主峰阿内托峰海拔三千四百零四米。什么概念？不到阿尔卑斯最高峰勃朗峰的四分之三，比玉龙雪山还矮一截。放在喜马拉雅面前，它连「高」字都不太敢当。

可就是这么一道不算高的山，隔出了欧洲差别最大的两个邻居。你坐一小时火车翻过山口，迎面撞上的是：晚饭时间从七点变成九点半，商店下午集体关门，语言从「Bonjour」变成「Buenas」，连人说话时站的距离都近了一拳。十九世纪流传过一句俏皮话：「**非洲从比利牛斯山开始。**」这话刻薄，但它戳中了一个真问题——为什么一山之隔，两边的气质差得像两个大陆？

这就是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。我们不打算罗列「法国十大景点」「西班牙必吃美食」，而是要弄明白：**两个挨在一起、同源同宗的拉丁大国，是怎么一步步活成两种欧洲的。**要回答它，得先回到最底层的那块地基：地理。

法国：欧洲平原的一部分

法国的地形，对「连通」这个词几乎是偏爱的。它的北部和西部直接接着北欧平原——一片从法国北部一直延伸到波兰、几乎没什么遮挡的大平地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从巴黎出发，无论商队、军队还是一种新想法，都可以不翻任何一座山就走到比利时、德国。

更要命的是河。法国的几条大河——塞纳河、卢瓦尔河、加龙河、罗讷河——水流平缓，大多可以通航，而且像轮辐一样把国土的各个方向串起来。在没有铁路和公路的两千年里，**能走船的河就是高速公路**。巴黎之所以是巴黎，一半原因就写在塞纳河里：粮食、木材、石头顺流而下，命令、时尚、税收逆流而上。一个「物流通畅」的国家，天然就更容易被拧成一个整体。

气候也帮了忙。法国西边受大西洋照顾，温和湿润，适合种麦子；南部贴着地中海，阳光充足。一块既好种粮、又好走货、还四通八达的土地，在欧洲属于抽到了上上签。

西班牙：一块悬在欧洲边上的高地

再看西班牙，画风完全不同。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核心是一块巨大的高原，叫梅塞塔高原——平均海拔六百多米，使得西班牙成为全欧洲平均海拔第二高的国家，仅次于满山是雪的瑞士。换句话说，西班牙不是一个平原国家，它是一块被群山托举起来、又几乎被大海围住的台地。

这块台地对「连通」很不友好：

- 河流倒是不少——塔霍河、杜罗河、瓜达尔基维尔河——但大多湍急、水位季节变化大、出海口还常在葡萄牙境内，基本上不能当航运干线用。西班牙在历史上长期是个「有河却走不了船」的国家。
- 高原内部被一道道山脉切成碎块，卡斯蒂利亚、安达卢西亚、加泰罗尼亚之间翻山越岭。直到今天，你从马德里坐火车去巴塞罗那，窗外的地形都在提醒你这事不轻松。
- 气候是极端的大陆性。卡斯蒂利亚有句老话形容自己：「九个月的冬天，三个月的地狱。」夏天四十度，冬天零下，同一块地。

大白话

用大白话说：法国的地理像一块铺开的桌布，什么东西放上去都容易滚到一起；西班牙的地理像一副鸡蛋托，一格一格的，每个格子里的东西很容易就各过各的。这个差别后来被历史放大了十倍——我们会在后面每一章里反复看到它的影子。

被「隔离」的半岛

北面有山，三面是海，西班牙在地理上几乎是个岛。这不是修辞。在中世纪，一个思想、一种技术、一场瘟疫从欧洲中心传到伊比利亚半岛，平均都要慢一拍。慢一拍平时不要紧，赶上大变革就要命——这本书后面会讲到，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席卷欧洲时，西班牙的反应速度和法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。

但「慢」也有另一面：隔离意味着**保护**。八百年里，半岛上发生的事情——穆斯林的统治、各小王国的混战与联姻——欧洲主流几乎插不上手，西班牙得以长出一套欧洲其他地方没有的「混血基因」。而法国因为没有这道山，永远暴露在邻居的目光和军队之下，反而被逼着早早把自己整合成一个能打仗的整体。

你看，还没翻开历史，地理就已经把两条岔路画好了：一个被迫「连通」，一个天然「隔离」。但先别急着下结论说「地理决定一切」——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起跑线上，其实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操作系统。那是罗马人留下的。下一章我们就去看这副共同的地基。

第二章 · 罗马人留下的同一副地基

同一个老师教的

上一章说，地理把法国和西班牙画上了两条岔路。但如果你把时间拨回两千年前，会发现一件反直觉的事：**这两个国家最初跑的是同一套操作系统**，而且装机装得比欧洲大多数地方都彻底。装机的人，是罗马。

罗马人进伊比利亚半岛很早——公元前二一八年，为了跟迦太基争夺西地中海，罗马军团就在今天的加泰罗尼亚登了陆。不过半岛人骨头硬，罗马花了整整两百年才把这块地方彻底打下来，是罗马征服史上耗时最长的工程之一。另一头，凯撒征服高卢（大体就是今天的法国）只用了八年（公元前五十八年到前五十一年），快得惊人。先记住这个细节：**西班牙这片土地从一开始就更难被「摆平」**，这个脾气后来一再发作。

但摆平之后，两边都被罗马化得透透的。罗马化不是派几个总督收税那么简单，它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移植：

- **语言**。今天的法语和西班牙语，都是拉丁语在各地「方言化」两千年的结果。法语里的「水」（eau）和西语里的「水」（agua）长得不像，但往上数都是拉丁语的 aqua。一个巴黎人和一个马德里人今天互相听不懂，他们的祖先在罗马帝国晚期的集市上却能聊起来。
- **法律**。两国都属于大陆法系——法律是写下来的成文法典，法官照着条文判案，而不是像英美那样主要靠判例积累。这个传统直接来自罗马法，后来拿破仑把它编成《民法典》，又反向影响了西班牙的立法。直到今天，两国的律师吵架，吵的都是同一套两千年前定下的概念。
- **城市**。里昂（罗马时代的卢格杜努姆）、尼姆、萨拉戈萨（凯撒·奥古斯都的名字变的）、梅里达、塞维利亚……两国最老的一批城市全是罗马规划的，至今还留着水渠、剧场、竞技场。你今天在尼姆和梅里达看到的罗马遗迹，保存得好到能办演出。
- **宗教**。罗马帝国晚期把基督教定为国教，高卢和伊比利亚都接了过去，后来都成了天主教的铁杆地盘。这一条的分量，后面很多章都会用到。

谁学得更像罗马

这里有个好玩的问题：两个学生，谁学得更像老师？

答案是西班牙，而且像得有点过分。罗马帝国中后期，最硬气的一批「罗马人」其实出自伊比利亚：哲学家塞内加是科尔多瓦人，诗人马提雅尔、卢坎是半岛人，连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——罗马「五贤帝」里的两位——都来自今天西班牙南部的同一个镇子。罗马老兵退役后大量安置在半岛，那里的拉丁语讲得又老又正。可以这么说：**在罗马帝国晚期，伊比利亚比意大利很多地方都「更罗马」。**

高卢也罗马化得很深，但差着一层：高卢地接北欧平原，罗马的边防压力一直在它身上，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部落虎视眈眈。伊比利亚则藏在半岛尽头，山挡着、海围着，反而安安稳稳地「腌」进了罗马文化里。第一章说的地理差异，在这里第一次显灵：连通的高卢一直要分心应付外面，隔离的半岛得以闷头入味。

系统一样，补丁不同

如果故事停在这里，法国和西班牙本该长成一对双胞胎。真正让两条路分开的，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，两边打上的「系统补丁」完全不同。

五世纪，日耳曼部落潮水般涌进帝国西半部。涌入高卢的是法兰克人——一支日耳曼部落，后来建立了法兰克王国，「法兰西」这个名字就是从「法兰克」来的。法兰克人带来的不是毁灭，而是一种新的上层结构：日耳曼式的国王、亲兵、习惯法，套在罗马的底子上。所以法国从基因里就是「罗马的底子 + 日耳曼的架子」。

涌入伊比利亚的先是西哥特人，也是日耳曼部落，剧本开头差不多。但七一一年，画风突变：**一支穆斯林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，几年之内拿下了大半个半岛。**接下来是将近八百年的伊斯兰统治——这是整个西欧独一份的经历，法国没有，意大利没有，谁都没有。

大白话

打个比方：法国和西班牙装着同一套罗马操作系统。法国后来装了个「法兰克」补丁，系统界面变了，内核还是罗马的。西班牙先装了个小补丁，然后被整个格式化了一半、装上了另一套叫「伊斯兰」的系统，跑了八百年，又被原来的系统一点点抢回来。两台机器今天看着还是亲戚，脾气能一样吗？

那八百年是怎么过的，抢回来的过程又怎么塑造了西班牙的国家性格？法国那边没有这段经历，又是用什么方式把自己拼成一个国家的？这就是下一章「拼图与锻造」要讲的事。

第三章·拼图与锻造

八百年，一寸一寸抢回来

七一一年穆斯林军队渡海之后，基督教势力被压缩到半岛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的山区里，只剩一条边。然后，欧洲人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「反攻」开始了——史称收复失地运动（西班牙语 Reconquista）：基督教各王国一寸一寸向南推进，从八世纪一直打到一四九二年攻陷格拉纳达，前后将近八百年。

八百年是什么概念？从南宋到今天也就八百年。这意味着「收复失地」不是一场战争，而是**几十代人的生活方式**：边境就是前线，男人打仗、城镇带城墙、教会兼做动员机关。西班牙人后来那种硬、那种对信仰的较真、那种「一寸都不能让」的劲头，很多是在这八百年里炼出来的。

但最关键的一点是：向南推进的不是一支军队、一个王国，而是一堆**各自为政的小王国**——莱昂、卡斯蒂利亚、阿拉贡、纳瓦拉、葡萄牙，彼此之间打仗的次数不比打穆斯林少。每收复一块地，就由离得最近的那个王国吃掉，各自立法、各自铸币、各自收税。所以到中世纪末，半岛上没有一个「西班牙」，只有一堆拼在一起的王国。

一场婚礼拼出来的国家

一四六九年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和阿拉贡的费尔南多结婚。几年后两人先后继承各自的王位（她一四七四年入主卡斯蒂利亚，他一四七九年入主阿拉贡），「西班牙」这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——同一个年份一四九二年，他们攻陷格拉纳达、完成收复失地，顺手资助了哥伦布。

听起来是个完美的统一故事？等等。这场婚姻拼出来的国家，拼缝大得惊人：

-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**各自保留自己的法律、议会、货币、度量衡**，甚至两个王国之间的边境上还设着关卡收关税。出了卡斯蒂利亚就算「出国」。
- 伊莎贝拉的遗嘱里明写：她的王国只传给卡斯蒂利亚的继承人。两人的联合本质上只是「共享一个王室」。

- 这套「各过各的」格局一直维持到十八世纪初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打完，波旁王朝上台，才用法令强行废掉阿拉贡系的自治权——那已经是一七〇七年以后了，距离那场婚礼过去了两百三十年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西班牙的统一像拼乐高——几块积木拼在一起，远看是一个整体，近看每块积木还是每块积木，连凸点都对不齐。卡斯蒂利亚是最大的一块，但它从来没有把别的块「熔化」掉。

法国：在铁砧上锻出来的

同一时期的法国，走的是完全相反的工艺。

九八七年，于格·卡佩当上法兰西国王时，他真正能管的只有巴黎周围一圈（叫法兰西岛，今天巴黎大区的名字还留着这段记忆），地盘比手下好些大诸侯都小。接下来的五百年里，卡佩家族干了一件欧洲政治史上最耐心的事：**一锤一锤，把诸侯的地盘敲进王权里**。联姻收回一块、绝嗣没收一块、打仗赢一块、花钱买一块。腓力二世在布汶战役（一二一四年）大破对手，把王室领地一下扩大好几倍；到「美男子」腓力四世，王权已经强到敢把教皇捏在手里。

真正把这团铁烧红、锻打成型的，是百年战争（一三三七—一四五三）。英格兰国王长期占着法国西部大片土地（甚至名义上是法王的封臣，这关系乱得一章说不完），双方在法国国土上打了一百一十六年。仗是灾难，但它带来一个副产品：**「法国人」这个概念第一次有了血肉**。圣女贞德喊出的是「把英国人赶出法国」——注意，不是「赶出诺曼底」或「赶出阿基坦」，是法国。外敌当前，说各地方言的人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「我们」。

战争在一四五三年结束。战后的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、王权最集中的国家。而且法国的王权有个特点：它每吞掉一块地方，就**把那块地方改造成自己**——派法官、收国税、推行王室法律。勃艮第没了，普罗旺斯没了，布列塔尼也并进来了，它们作为独立政治体的记忆被一层层磨掉。

两种工艺，两种后果

到这里，对比已经成型了：

西班牙是**拼**出来的：各王国保留各自的法律和脾气，靠一个共同的国王把大家「端」在一起。法国是**锻**出来的：王权像铁匠，把每一块新得到的领土都烧红、锤扁、打成同一块铁的一部分。

这两种工艺的后果会一直跟到今天我们这本书的最后几章。西班牙的「拼缝」到今天还在——加泰罗尼亚要独立、巴斯克有自治，根源都在「这个国家当初是拼起来的」；法国的「整块铁」也到今天还在——中央集权、巴黎独大，根源在「这个国家当初是被锻成一块的」。

不过先别急着往后跳。两个国家各自成型之后，都迎来了一个「巅峰时刻」，而且巅峰的姿势截然相反：一个把权力收进一座宫殿，一个把帝国摊到半个地球。下一章，太阳王和日不落帝国。

第四章·太阳王与日不落

把贵族关进一座宫殿

一六六一年，二十三岁的路易十四亲政。他接手的是一个刚从投石党运动里爬出来的法国——贵族武装叛乱、首都巴黎一度失控，小国王连夜逃出城。这段童年经历给他留下了一个终身信条：**贵族这种东西，不能消灭，但必须看住。**

他的办法前无古人：修一座空前华丽的宫殿——凡尔赛，然后让全国有头有脸的贵族都搬进来住。注意，这不是邀请，是软禁，只不过软禁在天堂里。凡尔赛的生活被设计成一套精密到分钟的仪式：早上国王起床（叫「起」礼），谁有资格递衬衫、谁有资格掌烛，晚上国王就寝谁能在场，全都按等级排好，成为贵族们争破头的「恩典」。一个大贵族的最高人生成就，可能就是在国王穿衣时递上右手那只袖子。

这套仪式的作用是什么？**把贵族的能量从「争地盘」扭到「争宠」上。**以前贵族在自家领地上养兵、铸币、跟国王讨价还价；现在他们住在凡尔赛，每天琢磨的是国王今天看了谁一眼。枪杆子换成了高跟鞋，领地换成了套房。与此同时，地方上的实权交给了国王派出的督办官（intendant）——一批拿工资的职业官僚，直接对巴黎负责。贵族负责表演，官僚负责干活，国王负责一切。「朕即国家」这句话是不是他说的有争议，但整个制度确实是照这四个字造的。

法国由此建成了当时欧洲最彻底的中央集权机器，配套的还有科尔贝搞的全国道路网、米迪运河、皇家工场。全欧洲的宫廷都开始学法语、模仿凡尔赛。这是一种「向内收」的巅峰：权力、财富、文化、品味，全部向一个点收拢——先收进巴黎，再收进宫里。

把帝国摊到半个地球

同一时期往前推一百年，西班牙走的是完全相反的姿势：**向外摊。**

查理五世（在西班牙叫卡洛斯一世，一五一六年起在位）继承的财产清单长得像个玩笑：西班牙、尼德兰、勃艮第、奥地利的哈布斯堡领地、神圣罗马帝国皇位，外加正在急速膨胀的

美洲殖民地。到他儿子腓力二世手里，又兼并了葡萄牙及其海外帝国（一五八〇年），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字面意义上「日不落」的国家——太阳在其领土上永不落下。

这台帝国机器的燃料是美洲的银子。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一五四五年开掘，鼎盛时一座城养了十几万人，挖出的白银整船整船运回塞维利亚。按常理，这应该让西班牙富甲天下。实际发生的事情却是经济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悖论：

- 银子太多，物价飞涨（史称「价格革命」），西班牙本土的东西变贵，反而竞争不过荷兰、英国、法国货。白银在西班牙只是**过路**——进来，转手就拿去付外国商人和外国雇佣军的账了。
- 腓力二世在位期间，王室财政**破产了三次**（一五五七、一五七五、一五九六年），日不落帝国是历史上欠债违约次数最多的大国之一。
- 本土工业一直没长起来。有钱为什么不办厂？因为来钱太容易了。买现成的比造划算，谁还费劲搞生产？后人给这种病起了个名字，叫「资源诅咒」的古代版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路易十四的办法是把全国的权力榨出来，浓缩在一座宫殿里；哈布斯堡西班牙的办法是把半个地球的财富汇进来，泼洒在欧洲的战场上。一个向内收，收出了一台至今还在运转的强国家机器；一个向外摊，摊出了「捧着金碗讨饭」的奇观——最富有的帝国，财政上最先破产。

巅峰姿势，决定后来的路

两种集权，塑造了两种国家肌肉。

法国练出的是「向内」的肌肉：官僚系统、全国税网、统一法令、对首都的绝对向心力。这套肌肉太强大了，以至于后来大革命把国王砍了头，国家机器却纹丝不动地传了下来——拿破仑接着用，第五共和国接着用，今天爱丽舍宫里那位还接着用。第九章我们会看到，法国今天的政治仍然是凡尔赛的直系后代。

西班牙练出的是「向外」的肌肉：跨洋管理、传教、全球贸易网络。但家里的「拼缝」（第三章那几块没对平凸点的乐高）一直没处理——帝国最辉煌的时候，加泰罗尼亚还在用自己的法律，巴斯克还在自收自税。等海外银子断流、海上霸权输给英国，家里没有一台锻打过

的机器兜底，衰落就来得又快又深。十八世纪的西班牙，从「欧洲的噩梦」变成了「欧洲的病夫」。

内收与外摊，是这本书后半程反复出现的一对姿势。它不光在政治里，还藏在两国对待语言、对待建筑、对待艺术的态度里。下一章先看语言——法国为什么只剩一种法语，西班牙为什么到今天还跑着四种语言。

第五章·一种法语与四种西语

大革命时，一半法国人不说法语

先从一个惊人的事实开始。一七九四年，法国大革命正酣，教士格雷瓜尔向国民公会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：《消灭方言的必要性与手段》。报告摸底的结果令人尴尬——**当时全法国大约一半人口根本不会说法语**。布列塔尼人说布列塔尼语（一种凯尔特语），南方大片地区说奥克语，阿尔卑斯山区说各种方言，东边还有说德语方言的。所谓「法语」，当时主要是巴黎及其北方的语言。

报告标题里的那个动词值得玩味：不是「推广」法语，是「**消灭**」方言。革命政府的逻辑很直接：共和国是「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」，语言就是整体性的器官——你说的话都不统一，选票和法律怎么统一？

这个工程在十九世纪末被公立教育彻底完成。一八八〇年代的茹费里教育改革确立了免费义务教育，学校只用法语，而且对方言是**真打**的：布列塔尼的学校里，说方言的孩子要被挂一块木牌示众，传给下一个「犯规」的人，放学时拿着牌子的挨罚。

结果？法国赢了，赢得干干净净。今天法国境内的地方语言——布列塔尼语、奥克语、科西嘉语、巴斯克语（法国境内也有巴斯克地区）——要么奄奄一息，要么只剩文化情怀。法国至今没有批准《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》，因为宪法认定「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」，句号。一个统一了语言的国家，和第三章说的那块「锻成一块的铁」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。顺带一提，布列塔尼人流传着一句当年教室里的标语：「禁止随地吐痰，禁止说布列塔尼语。」历史学家考证它未必真有实物，但它是那个年代集体记忆的准确浓缩——两件事被并列地嫌弃着。

西班牙：语言停战的国度

翻过比利牛斯山，情况整个反过来。今天的西班牙跑着四种语言：

- **卡斯蒂利亚语**，就是我们说的「西班牙语」。注意西班牙国内一般不叫它 *español*（西班牙语），而叫 *castellano*（卡斯蒂利亚语）——因为对其他语言区的人来说，「西班牙」不等于「卡斯蒂利亚」，这个称呼本身就是政治表态。

- **加泰罗尼亚语**：加泰罗尼亚、巴伦西亚、巴利阿里群岛约一千万使用者，有自己的文学传统，中世纪时是地中海贸易大港的语言。
- **加利西亚语**：西北角，跟葡萄牙语本是同根，听起来像西语和葡语的中间态。
- **巴斯克语**：最奇特的一个。它**不属于印欧语系**，跟地球上任何已知语言都没有亲戚关系，是欧洲大陆上唯一从史前活到今天的「语言孤岛」。语言学家研究它，就像生物学家研究鸭嘴兽。

这四种语言在一九七八年宪法里各有名分：卡斯蒂利亚语是全国官方语言，人人有义务会；其余三种在各自自治区是**共同官方语言**。在巴塞罗那，学校上课用加泰罗尼亚语，路牌是加泰罗尼亚语在前；在圣塞瓦斯蒂安，警察局的名字得用巴斯克语写。这种安排，法国人看了直摇头——在巴黎的逻辑里，这相当于在国家身体里划了几块语言租界。

为什么一个消灭了方言，一个供着方言

不是因为西班牙人更宽容。佛朗哥时代（一九三九—一九七五），西班牙也搞过法国式的语言统一：学校只准教卡斯蒂利亚语，公共场合说加泰罗尼亚语会被罚款，教科书里把地方语言贬为「方言」。手段不比茹费里温柔。

区别在时机和底牌。法国动手时（十六世纪的维莱-科特雷敕令就规定行政用法语，大革命加鞭，十九世纪收尾），地方语言虽然活得好好的，但**地方政治实体早就被锻没了**——布列塔尼不再是公国，普罗旺斯不再是伯国，方言背后没有「另一个国家」撑着。语言之争只是文化之争。

西班牙动手时，底牌完全不同。还记得第三章的乐高吗？加泰罗尼亚、巴斯克这些块从来没有被熔化过，它们有自己的中世纪议会、自己的商法、自己的光荣记忆。**在西班牙，语言背后始终站着一个「另一个可能的祖国」**。佛朗哥压了三十六年，不但没压灭，反而把「说加泰罗尼亚语」压成了「反抗独裁」的代名词——独裁一死，语言带着政治能量整个反弹回来。一九七八年宪法干脆把多语言共存写进国本，算是承认了这笔历史欠账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语言统一在法国是「国家建设的最后一道工序」，在西班牙是「永远谈不拢的停火协议」。法国人用学校消灭方言时，消灭的只是口音；西班牙人想用同样办法时，动的是别人的祖国。

语言的分歧只是表象，背后是两种国家结构的对峙。这个对峙今天还在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里打着滚，我们到第九章详谈。先把镜头从制度拉回日常生活——下一章讲一个每个游客第一天就会撞上的差异：为什么西班牙人的晚饭要到九点半才开始。

第六章·晚饭九点半

马德里的钟比伦敦快，太阳却不认

先看一个地图上的冷知识。打开经度图：伦敦大约在本初子午线上，马德里在西经三度四十分——**比伦敦还要靠西**。加利西亚的拉科鲁尼亚，西经八度半，快赶上爱尔兰了。按太阳的规律，西班牙全国都应该和英国、葡萄牙用同一个时区（格林尼治时间）。

但实际上，西班牙用的是中欧时间——和柏林、巴黎、华沙同区，比它的太阳位置整整快一个小时（夏令时期间快两个小时）。为什么？一九四〇年，佛朗哥为向希特勒示好，把西班牙的钟拨成了「柏林时间」。独裁者死了半个世纪，这个拨错的钟却一直没拨回来。西班牙议会二〇一六年还正儿八经地讨论过要不要改回去，最后不了了之——改时区兹事体大，全国的作息都要跟着重排。

所以西班牙人「晚饭九点半」的真相是：**按太阳算，其实只有七点半到八点**，跟法国人差不多。不是西班牙人活得离谱，是他们的钟表和太阳签了一份一九四〇年的停战协议，一直没解约。

午睡：被误解最深的西班牙标签

游客对西班牙作息的第二个误解是「他们下午都睡觉」。真实情况是：传统午休（siesta）本来不是懒惰，而是农民的精密安排——安达卢西亚的夏天下午三点，地面温度能把鞋底烤软，干农活等于自残，于是把一天劈成两段：清晨干一阵，躲开午后毒日头，傍晚再干一阵。中午那两三个钟头，吃饭、休息、陪家人。这是热浪里的理性，不是懒散。

进入城市经济后，这个「劈成两段」的习惯留了下来，变成了欧洲最奇怪的工作日：九点上班，下午两点午饭（午饭是正餐，要吃一小时），四五点回办公室，晚上七八点才下班。结果是西班牙人**待在单位的时间全欧洲最长**，但产出并不比人多——很多时间就耗在「人在岗」上了。经济学家批评这个作息降低了效率，西班牙政府几次想改成「朝九晚六」，最大的阻力居然是：大家舍不得那顿正经午饭。

至于真睡午觉的，今天主要剩老人、小孩和南方小镇。马德里写字楼里的年轻人，午休是端着咖啡刷手机。标签还在，生活已经变了。

法国：把午休升格成制度

法国对时间的改造走的是另一条路：不动作息的节奏，直接动**总量**。二〇〇〇年，法国通过三十五小时工作制，法定周工时从三十九小时砍到三十五小时——多出来的时间要么补休，要么算加班费。配套的还有每年五周带薪假（法定底线）、八月全民大休假。八月的巴黎，本地人几乎清空，面包店门口贴着「八月十五日回来」，整个城市交给游客。

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镜像：**西班牙人每天在单位泡的时间长，法国人一年工作的总时间短**。西班牙的问题是「时间被切碎」——一天被午饭劈成两半，两头都拖长；法国的问题是「时间被立法」——国家和工会坐下来，把一年里属于工作的时间像切香肠一样定量分走。两种都不太「自然」，但切法完全不同：西班牙的作息是历史和气候熬出来的习惯，法国的作息是谈判桌上谈出来的制度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两国的「生活节奏」其实都不是天生的。西班牙的钟被一九四〇年的一次政治表态拨错了，一直没拨回来，全国人的晚饭就被钉在了九点半；法国人的清闲是法律一刀一刀切出来的，三十五小时就是三十五小时，少一分钟都不行。你以为是民族性格，其实一个是化石，一个是合同。

节奏感：数字里的生活

几个小数字，感受一下两种时间的质感：

- 电视黄金时段：法国晚上九点前后开播，西班牙要拖到十点半——因为观众还没吃完晚饭。
- 西班牙人平均比欧洲平均水平少睡将近一个小时（各种睡眠调查的结论都指向这个方向），夜里不睡、早上照起，长期「社会性时差」。
- 周五晚上十点的马德里地铁站人满为患，很多是出门吃宵夜的；同时间的巴黎地铁，人满为患是因为大家刚加完班——哦不对，法国人周五不加班，是去赶开胃酒（apéro）的场子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平均数下的速写，个体千差万别。但它说明一件事：「**几点吃饭、几点睡觉**」**这种看起来最私人的事，深处都是制度**——时区是政治决定的，工时是法律规定的，假期是谈判谈出来的。民族性格这张底牌，翻过来往往写着一行小字：此处有制度出没。

作息是无形的基础设施。下一章看有形的：石头。为什么巴黎的楼都长得像一个模子刻的，而西班牙的建筑像一锅咕嘟了八百年的杂烩汤？

第七章·石头写的性格

巴黎：一座被「对齐」过的城市

在巴黎的楼顶俯瞰，你会看到一种近乎强迫症的秩序：一排排六七层高的石灰岩小楼，米白墙面、深灰锌皮屋顶、统一的窗台线，沿着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排开，齐得像阅兵方阵。这不是自然长出来的，是规划出来的——而且规划者的手段相当粗暴。

一八五三年，拿破仑三世任命奥斯曼男爵改造巴黎。当时的巴黎是中世纪老底子：街巷狭窄弯曲、污水横流、霍乱频发，而且——这对皇帝很重要——**窄巷子特别适合街垒战**，革命者一晚上就能用石板和家具把一条街变成堡垒。奥斯曼的解决方案是把老城切开：推平两万多栋老房子，辟出放射状的宽阔大道。官方理由冠冕堂皇——卫生、交通、采光；私下人人都懂的另一个理由是：大炮在宽马路上才有射界，骑兵冲锋需要直线。

这场改造留下了今天巴黎的城市模板：统一的檐口高度、统一的石材颜色、统一的立面节奏。后世巴黎的新楼，连顶楼退台的角度都要报批。所以巴黎的天际线一百多年几乎没变——变化发生在别处：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当年被骂翻天，拉德芳斯新区被整个推到城外。法国建筑的逻辑是：**秩序是第一位的，个性可以有，但请在秩序画好的格子里发挥**。这当然是凡尔赛那套「内收」美学的直系后代。

往前追溯，法国建筑的主旋律一直是「定义规则」：哥特式在巴黎圣母院一带定型，然后教会全欧洲什么叫高耸和飞扶壁；古典主义在卢浮宫东立面定型，给欧洲立了三百年「端正」的样板。法国建筑史就是一部「我来定标准」的历史。

西班牙：一锅熬了八百年的杂烩

西班牙的建筑完全是另一路数。它的关键词不是「对齐」，是「**叠床架屋**」——一层文明不拆，直接盖在另一层上面。

最震撼的例子在科尔多瓦。大清真寺内部是八百多根柱子撑起的红白相间的双层拱廊，走进进去像进了无穷大的柱林。这本是伊斯兰建筑在西方的巅峰。然后一二三六年基督徒收复科尔多瓦，干了一件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：**不拆，在清真寺正中间凿开屋顶，插进一座文艺复**

兴式大教堂。于是你今天走进科尔多瓦大清真寺，会在伊斯兰柱林的腹地突然撞见一座高耸的哥特-文艺复兴祭坛，两种空间逻辑在同一个屋檐下打架。查理五世事后看到，说了那句名言：「你们毁掉的是举世无双的东西，建起来的却随处可见。」——但骂归骂，建筑保留下来了，三层文明叠在一处：罗马桥在门口，清真寺在身下，教堂在心脏里。

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是另一个极端：伊斯兰庭院里的狮子院，水渠穿堂、拱窗镂空、墙面上细密到令人发毛的灰泥雕刻——它追求的是秩序，但那种秩序是**装饰性**的：光线被揉碎，空间被镂空，人在里面会忘了结构，只记得氛围。这和法国古典主义「结构清清楚楚立在那儿给你看」的秩序，是两种相反的美学。

再到近代，巴塞罗那的高迪把这种「不守规矩」推到顶点：圣家堂的柱子像树干一样分叉，巴特罗之家的外墙像波浪和骨骼，没有一根直线。高迪要是生在巴黎，大概率通不过报批；在巴塞罗那，他成了城市的图腾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法国建筑的关键词是「标准」——我先定一套规则，然后全国对齐，谁冒头谁报批。西班牙建筑的关键词是「叠加」——罗马的、伊斯兰的、哥特的、高迪的，一层盖一层，谁也别拆谁。一个是锻出来的铁板，一个还是那副没对齐凸点的乐高。

城市形态里的政治

两种建筑性格，直接长成了两种城市形态，到今天还在影响生活：

- 巴黎是「同心圆」结构：中心是皇宫和博物馆，一环一环往外扩，编号从第一区顺时针转到二十区，像个蜗牛壳。权力和优雅在中心，移民和贫困被推到环城公路外（所谓郊区问题，第九章还会碰到）。
- 西班牙的城市是「广场网络」：每个街区有自己的小广场（plaza），广场上有教堂、酒吧和市场，生活以广场为圆心自转。马德里没有巴黎那种唯一的「中心」，太阳门是名义中心，但真正的马德里有几十个各过各的广场。

一个是单中心、向心收拢；一个是多中心、就地成团。你在第一章看到的鸡蛋托和桌布，在第三章看到的拼图和锻铁，在石头里又显了一次形。建筑是最诚实的史书——它改不了口供。

石头记下了结构，画布记下的是眼神。下一章去两座博物馆：卢浮宫和普拉多，看两个民族分别喜欢盯着什么看。

第八章·两种眼神

两座博物馆，两种眼神

想快速摸清一个民族喜欢看什么，最快的办法是去它最大的美术馆数画。法国的卢浮宫和西班牙的普拉多，藏品结构上有个一目了然的差别：卢浮宫是「全世界的艺术史」，从埃及木乃伊到希腊雕像到意大利文艺复兴，法国自己只是其中一章；普拉多是「西班牙的眼睛」，委拉斯开兹、戈雅、格列柯占着绝对主角，一个馆的半壁江山是本国黄金时代。

这不是布展的偶然。它暴露了两种艺术传统最深处的区别：**法国艺术习惯向外看——定义什么叫美，然后推销给全世界；西班牙艺术习惯向内看——死死盯着人本身，尤其是人的苦难、尊严和死亡。**

普拉多：盯着你，不躲

先看普拉多的三件镇馆之宝，注意它们共同的眼神。

委拉斯开兹的《宫娥》（一六五六年）：表面看是宫廷群像——小公主、宫女、侏儒、狗。但画家把自己画进了画里，正对着你看；镜子里还映出国王夫妇。这幅画几百年里被解读了无数遍，核心张力在于：它让观画的人意识到「自己也正在被看」。达芬奇画神秘的微笑，委拉斯开兹画的是「对视」这个动作本身。而且他把宫廷里的侏儒、侍女画得和公主一样有尊严——在别的宫廷画里，这些人只是点缀；在他笔下，是人。

戈雅的《一八〇八年五月三日》：马德里市民被法军行刑队枪决。画面中央那个穿白衬衫的平民，双臂张开、满脸惊恐，下一秒就要死；对面是一排看不见脸的士兵，枪管整齐如机器。这幅画被公认为「现代战争画」的起点，因为它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：**站在失败者一边，画没有英雄、只有屠杀的战争**。戈雅晚年的「黑色绘画」更极端——他直接把《农神吞噬其子》画在自己家墙上，血淋淋的，天天看着它吃饭。

格列柯的宗教画：人被拉长、扭曲，颜色像闪电照亮的前夜。他要的不是「像」，是灵魂出窍那一瞬间的战栗。

看出共同点了吗？西班牙大师们的主题清单里，反复出现的是：死亡、受难、尊严、宗教狂热、肉体的真实（包括丑和老）。这是反宗教改革和八百年宗教战争泡出来的眼神——在一个经历过宗教裁判所的国度，艺术对「苦难的重量」有一种别国没有的熟悉。

卢浮宫：定义光，定义美

法国艺术的主线几乎是反过来的。文艺复兴之后，法国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办法兰西学院和皇家美术学院——把「什么叫好画」变成一套可以打分、可以排座次的学术标准。达维特的《马拉之死》《拿破仑加冕》，每一笔都符合规范，历史画高居鄙视链顶端。法国艺术第一个本能是：**立标准**。

更有意思的是第二个本能：**反标准，而且反完再立一个新标准**。印象派当年被学院沙龙拒之门外，干脆自己办展；莫奈他们跑到户外追光，画火车站的蒸汽、草垛在黄昏里的颜色。十几年后，印象派自己成了新标准，全世界学。再往后塞尚、立体主义（毕加索是西班牙人，但立体主义是在巴黎发生的——这个细节很说明问题，待会儿回来讲）……十九到二十世纪的法国艺术史，就是一部「造反—收编—再造反」的循环史，每一轮都给全世界输出一套新语法。今天全世界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，祖师爷都可以追到巴黎。

题材上也对得上：法国绘画的黄金主题是光、风景、现代生活的体面与无聊——野餐、划船、歌剧院、咖啡馆。哪怕画苦难（比如籍里柯的《梅杜萨之筏》），也要把它升华成纪念碑式的英雄构图。西班牙画苦难是让苦难直视你，法国画苦难是给苦难加一个画框、一段说明、一套理论。

毕加索问题：为什么他要离开西班牙才成为毕加索

最有说服力的一桩公案是毕加索。马拉加人，十四岁就进了巴塞罗那的美术学院，技艺早熟得吓人。但他所有的爆发——蓝色时期之后、立体主义、《格尔尼卡》——全部发生在巴黎。为什么？

因为二十世纪初的巴黎是全世界唯一「定义标准」的战场：画商、评论家、沙龙、来自各国的野心家都在那儿。要在艺术史上留名，你必须去巴黎打擂台——就像今天做AI的要去旧金山湾区。西班牙的土壤养得出凝视苦难的大师，但养不出「改写规则」的产业。法国输出的是标准，西班牙输出的是人。

《格尔尼卡》本身是两种传统的合体：题材是纯正西班牙的（小镇被炸、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，戈雅的直系血脉），语言和野心是巴黎的（用一套全新的视觉语法向全世界宣布这件事）。它一九三七年问世，戈雅《五月三日》的精神在129年后接上了力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法国艺术像一所大学——先立学科标准，再由造反者推翻立新，循环输出理论；西班牙艺术像一间告解室——不谈理论，只逼视人的真相，苦难、尊严、死亡。你缺什么就会被哪个击中：学画的人朝拜巴黎，怀疑人生的人在普拉多走不动道。

艺术是眼神，政治是骨架。下一章回到制度：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今天到底是怎么运转的——为什么法国总统权力大到吓人，西班牙首相却连自家自治区都搞不定。

第九章 · 总统与自治区

法兰西：选出来的国王

一九五八年，法国差点打内战。第四共和国政府换得像走马灯（十二年换了二十多届），阿尔及利亚危机把军队逼到哗变边缘，伞兵占领了科西嘉。国会把赋权的电话打给了隐居多年的戴高乐。戴高乐的条件是：旧宪法不行，重新立一部。于是有了第五共和国——法国现行宪法，一九五八年十月生效，用到现在。

这部宪法的核心设计，一句话说透：**造一个民主程序选出来的国王**。总统由全民直选（一九六二年起），任期五年，权力清单长得让其他欧洲国家眼红：任命总理、解散国民议会、主持内阁会议、握有核武器按钮，宪法还专门留了一条「非常时期总统可全权处置」的紧急条款。议会对总统的制约有限——多数时候，议会多数党就是总统自己的党。

为什么法国人受得了这么大的总统权力？因为历史欠账。第三、第四共和国都是「议会独大」，结果是政府平均寿命不到一年，谁都干不成事。戴高乐的诊断是：法国这种国家，平时吵得凶，遇事必须有一个人说了算。这个诊断的底层，正是凡尔赛那条血脉：法国政治从来假设**权力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中心**。国王没了，中心不能没。

中央集权也一并留了下来。法国一九八二年搞过放权改革，设了大区一级，但底子还是中央-省-市镇的垂直体系，全国三万六千个市镇的账都要跟巴黎算。精英更是如此：想治理法国，先考进巴黎的几所「大学校」（公务员最高层的摇篮国立行政学院，二〇二一年才改革改名），校友网络覆盖总统府、大企业和央行。法国人自己管这叫「巴黎与法国沙漠」——出了环城路，就是另一个国家。第七章说的同心圆城市，在政治上是同一张图。

西班牙：一杯人人有份的咖啡

西班牙现在的政治操作系统，是一九七八年宪法装的。佛朗哥一九七五年死后，胡安·卡洛斯国王和各党派谈出了一部妥协宪法，其中最天才也最麻烦的设计，是自治区体制（Estado de las Autonomías）：全国划成十七个自治区加两个自治市，教育、医疗、治安大头都下放给自治区管。今天西班牙人看病、上学，打交道的主要不是马德里，是自己的自治区政府。

这套体制是怎么来的？初衷本来是「特事特办」：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有历史权利、有自己的语言（第五章），佛朗哥又压了它们三十六年，转型时得给个说法——让它们先自治。可安达卢西亚一看不干了：凭什么它们有我们没有？当时中央政府管地区事务的部长克拉维罗说了句名言：「**咖啡大家一起喝**」（café para todos）——要自治就都自治。于是特事特办变成了普惠制，十七个自治区全部上桌。

结果是西班牙成了「事实上的联邦，名义上的单一制」：自治区掌握全国一半的公共开支（比例高过德国），但宪法里找不到「联邦」两个字。而且自治程度并不均齐：巴斯克和纳瓦拉有自己的财政协定，自己收税、再跟马德里分成；加泰罗尼亚没有这个待遇——这个差别，是后来加泰罗尼亚闹独立的经济引信之一。

加泰罗尼亚危机：拼缝崩开的一瞬间

二〇一七年十月一日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不顾宪法法院禁令，强行举行独立公投，警察在投票站外与选民冲突的画面传遍世界。十月二十七日，自治区议会单方面宣布独立；同一天，马德里启动宪法第一百五十五条，解散自治政府、直接接管加泰罗尼亚。这是西班牙民主化以来最严重的宪政危机。

这场危机，用我们前面铺好的框架看，一点都不意外：它是第三章那条「拼缝」在一九七八年停火协议到期后的崩开。法国永远不会有这一章——不是因为法国没有布列塔尼，而是因为布列塔尼作为政治体早被锻没了（第五章），它连「宣布独立」的制度抓手都找不到。加泰罗尼亚有自己的议会、自己的警察、自己的语言电视台，它只差一步就是个国家。西班牙的放权给了它所有零件，然后指望它永远不组装。

两台发动机，各有抖动

对比一下两台政治发动机的工况：

- **法国**：决策快、执行力强，总统一拍板全国动。代价是合法性高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——他不受欢迎时，整个社会没有缓冲，于是有了黄马甲式的街头总动员。法国政治的病是「梗塞」：要么畅通，要么堵死。
- **西班牙**：决策慢、凡事要谈，中央政府常常搞不定自治区（疫情期间马德里和自治区为封城令打架就是实例）。代价是永远谈不完。西班牙政治的病是「渗漏」：权力分散，责任也分散。

但请注意一个反常的结论：西班牙人虽然天天骂自家政治，民主满意度调查里他们对「体制本身」的信心并不低——因为自治区体制同时是**佛朗哥记忆的解药**：把权力摊开，就是为了任何人再也无法把权力攥回一只拳头里。下一章我们会看到，连修高铁，两国都是同一种性格的延续：一个从中心画直线，一个给每个角落都接上。

第十章·星形与放射形

先修哪条线，是个政治问题

修高铁，表面是工程，实际是政治宣言：**你把哪两个点连起来，就等于宣布谁和谁是一家人**。法国和西班牙恰好给出了两份相反的宣言。

法国的答案写在一张一八四二年的法律里。那年，法国议会通过铁路规划，以工程师勒格朗命名的「勒格朗之星」定下了全国铁路的总图：**所有干线从巴黎向外辐射**，像海星的腕足。里昂到巴黎、马赛到巴黎、波尔多到巴黎——都有了；里昂到马赛？里昂到波尔多？请先到巴黎换乘。一九八一年欧洲第一条高速铁路（巴黎—里昂）通车，TGV 网络完全继承了这个星形基因：快是快，但快的是「进出巴黎」这个方向。两个外省城市之间想坐火车，常常还不如开车。法国人有个自嘲的段子：什么叫外省？就是去任何地方都得先路过巴黎的地方。

这张网的逻辑和凡尔赛是同一条：**中心越方便，边缘就越离不开中心**。铁路是中央集权的水泥（哦不，是钢轨）。它效率惊人地塑造了法国：企业总部、大学、医院、机会全部向巴黎堆，外省被吸干——第九章说的「巴黎与法国沙漠」，一半是铁路铺出来的。

西班牙：给每块乐高都接上铁轨

西班牙的高铁（AVE）一九九二年才起步，第一条线马德里—塞维利亚，为塞维利亚世博会赶工。起点比法国晚了十一年。但接下来的剧情反超了：**今天西班牙的高铁里程全欧洲第一、全世界第二（仅次于中国）**，三千七百多公里，比法国还多。

怎么做到的？看它的选线逻辑就明白了。AVE 名义上也是从马德里放射，但它的真实驱动不是「进出首都」，而是第九章那杯「人人有份的咖啡」：**每个自治区都要通，不通就是政治歧视**。于是修了很多法国工程师看来荒谬的线——通往人口十几万的小城，乘客寥寥，车站修得漂漂亮亮，一天停不了几班车。西班牙人自己管这些叫「开往无人区的 AVE」。

从纯经济账看，这是浪费。从政治账看，这是另一种算法：在一个有独立运动的国家里，**铁轨是国土的缝线**。加泰罗尼亚通了 AVE，巴斯克通了 AVE，加利西亚那个山区也通了 AVE

——每一公里都在回答「你是不是国家的一部分」。法国用铁路强化中心，西班牙用铁路缝合边缘。同样的放射形，出发点是反的。

公路：收费站与免费午餐

公路的故事更直白。在法国开长途，你会不断被收费亭拦下：法国的高速公路大头是特许经营公司修的，过路费按里程收，巴黎开到马赛，过路费加上油钱是一笔看得见的开销。好处是路况好、养护责任清楚；坏处是贵，而且长途货车为了省钱挤上免费国道，又慢又危险。

西班牙的高速公路大头是免费的。一九八六年加入欧共体后，西班牙拿到一笔欧盟结构基金和凝聚基金——欧盟为了拉平穷成员国与富国差距而设的钱袋子——其中相当一部分砸进了公路。三十年间，西班牙修出了**全欧洲最长的高速公路网**（约一万七千公里，超过法国），而且绝大多数不收钱。今天的现实是：从法国开车翻过比利牛斯山进西班牙，第一个感受往往是——欸，收费站没了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法国的交通网像一个漏斗——所有路都往巴黎这个口收，想过路先交钱；西班牙的交通网像一块补丁毯——欧盟出钱、政治定线，先把每块补丁都缝上，有没有那么多车用，以后再说。一个为效率优化，一个为缝合优化。

路修完之后

两套网络的后果今天清晰可见。法国正在为星形网补课：近几年立法限制国内短途航线（有火车两个半小时内直达的航线要取消），试图把TGV 的覆盖往外省之间抻；西班牙则在为补丁毯付账：高铁网络的运营亏损和养护成本是笔长期压力，一些低客流线路该不该开，每隔几年吵一次。

顺便说个收尾的对照：在法国坐TGV，误点了乘客骂国家；在西班牙坐 AVE，准点到站时车长会广播通知，如果延误超过一定时间，票款全退——这是 AVE 从开通第一天就有的承诺。法国铁路的骄傲是「我是欧洲第一」，西班牙铁路的骄傲是「我说到做到」。连骄傲的姿势，都是一个向外，一个向内。

交通把国家的骨架画完了。但两个国家还有一层看不见的基础设施要处理：记忆。大革命的断头台和西班牙内战的战壕，到今天还在影响这两个社会怎么谈论自己。下一章，看它们怎么处理各自的伤口。

第十一章·记忆的两套办法

法国：把伤口升格成神话

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，巴黎办了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庆典，香榭丽舍大街上游行盛况空前，全世界直播。停下来想想这件事有多奇特：法国人举国欢庆的那个日子，纪念的是一场以断头台、内战和恐怖统治收场的革命。旺代地区镇压死的人以十万计，丹东、罗伯斯庇尔最后都上了自己立的断头台。这要是放在别的国家，多半是一段想绕开的黑历史。法国的处理方式是反着来：**不回避，直接升格**——把一七八九年变成国家的诞生日，把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」变成人类的普世价值，把断头台收进历史博物馆，把攻占巴士底狱变成国庆烟花。

这套「升格疗法」的关键手法是**普世化**：只要革命的遗产被宣布为「属于全人类」，那么它的血腥就自动降格为「分娩的阵痛」。阵痛当然疼，但没人会为好日子的阵痛而持续羞耻。法国把对自己的审判，变成了给全世界的开学典礼。

当然，升格不是一次到位的，有些伤口升不动，就先压着。旺代内战的记忆沉默了一百多年；维希政权（二战中跟德国合作的法国政府）的记忆被「全民抵抗」的神话盖了三十年——戴高乐需要这个神话来重建国家自尊，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才被戳破；一九九五年，希拉克才第一次以总统身份承认：**是法国国家（不只是几个坏警察）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围捕**。阿尔及利亚战争更夸张，官方长期只准叫它「事件」，拖到一九九九年才立法承认那是一场「战争」。法国的办法是：压得住就先压着，压不住就升格。但无论如何，有一个机构始终在主持这场处理：**国家**。记忆是中央的行政事务。

西班牙：先把伤口埋起来，活着要紧

西班牙的伤口深得多，也近得多。一九三六到三九年的内战死了约五十万人，杀人的和被杀的住在同一个村子、甚至同一个家族；之后佛朗哥又统治了三十六年，镇压是日常。一九七五年佛朗哥死在床上时，摆在整个国家面前的问题是：这笔账，算还是不算？

西班牙人给出的答案震惊了后来的历史学家：**不算，先埋起来**。这就是转型时期著名的「遗忘协定」（Pacto del olvido）——不是哪份签了字的文件，而是全社会心照不宣的约定：为

了和平过渡，谁都不翻旧账。配套的一九七七年大赦法，把独裁时期的政治犯放了，同时也把独裁者的罪行一并勾销——受害者与加害者被同一条法律「平等」地赦免了。

这个选择放在当时几乎无可指摘：军方还提着枪，政变风险实实在在（一九八一年真的来了一次未遂政变，士兵开枪占领了议会）。用遗忘换民主，是一笔救命的交易。但遗忘不是免费的，它有利息。利息从两千年后开始集中到期：佛朗哥时代被抢走的婴儿、路边乱葬岗里的十几万尸骨、被迫害家族的档案——**孙子辈开始挖祖父辈的坟**，字面意义的挖。二〇〇七年《历史记忆法》、二〇二二年《民主记忆法》，一步步追认受害者；二〇一九年，佛朗哥的灵柩终于被迁出他生前修的「烈士谷」大教堂。整个过程缓慢、痛苦、党派恶斗——右派骂「揭开伤疤」，左派骂「来得太晚」，挖出来的每一具骸骨都还在打官司。

两种疗法，两种后遗症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法国处理伤口的办法是把它变成文身——先消毒（压几十年），再纹成一个骄傲的图案，逢人展示：看，这是我们给人类的礼物。西班牙的办法是打封闭针——先不疼再说，代价是病灶还在，几十年后家属要重新开刀。法国的后遗症是「神话太硬」：谁质疑革命叙事谁就是不爱国；西班牙的后遗症是「坟头太多」：全国至今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内战死者没有名字、没有墓碑。

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？还是回到第三章那两道工序。法国的伤口，再大也是「一块铁内部的事」——砍的是同一个国家的国王，杀的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，愈合后仍然是那块铁，所以国家敢把记忆收归国有。西班牙的伤口是「拼缝两边的事」——内战双方背后站着不同的地区、语言、教会与反教会、马德里与巴塞罗那，任何「国家统一叙事」都会被其中几块乐高拒绝签收。记忆无法收归国有，就只能暂时私有化：各家族记各家的。

还有一点更日常的对照：法国国庆是七月十四日，全民共情，没争议；西班牙的国庆是十月十二日（哥伦布抵达美洲的日子），年年有人抗议「为什么要庆祝殖民」。一个国家连「庆祝哪天」都没能达成共识——拼缝在国家日历上都看得见。

历史讲完了。最后一章，把两个国家拉回今天，摆开数据：经济、寿命、假期、幸福感——折腾了这么多，到底谁的日子过得更好？

第十二章·谁的星期天更舒服

先看钱：法国赢，但没赢多少

折腾了十一章，该结账了。先从最硬的指标开始。

人均GDP，法国大约四万五千美元，西班牙大约三万三千美元——法国明显更富。法国有全世界排得上号的产业体系：航空（空客）、核电、奢侈品、农业出口，样样是重器；西班牙的经济支柱是旅游、汽车装配和农业，工业底子薄一档。失业率更能说明问题：法国的失业率长期在百分之七上下，在发达国家里已经算难看；西班牙更惨，常年两位数的失业率是它的慢性病，年轻人失业率最高时（二〇一三年前后）甚至超过一半——每两个找工作的西班牙年轻人里，就有一个找不到。

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？这本书前面的章节可以给出大部分的解释链：法国那块「锻出来的铁板」——统一的法律、语言、市场、向巴黎集中的精英和资源——天生适合组织大工业；西班牙的「乐高」结构加上地形破碎、起步晚（工业化比法国晚了近百年），追到今天还差着身位。地理和历史从第一章起就在给这张工资单签字。

但注意一个细节：差距没有想象中悬殊。按购买力平价算，西班牙的人均GDP大约是法国的八成半——而在一九七五年佛朗哥死的时候，这个比例大约是七成。五十年追了一成半。西班牙是二战后欧洲追赶最成功的国家之一，只是它追的对象恰好是欧洲标杆。

再看日子：西班牙反手赢回来

把指标从「生产」换到「生活」，排行榜整个翻面。

寿命：西班牙人均预期寿命约八十四岁，欧盟第一、世界前列（仅次于日本、瑞士这一档）；法国约八十三岁，也很强，但差着一年。钱更多的国家，人反而活得更短。研究者的解释绕不开地中海饮食、社交密度和阳光——马德里的年日照时数大约两千八百小时，巴黎只有一千六百多小时，将近一倍。阳光不直接续命，但它把人赶出屋子、赶进广场，广场上有朋友，而「常常见到朋友」在长寿研究里的权重高得惊人。

工时的真相：别被午睡的传说骗了。按经合组织统计，西班牙人年均工作时长比法国人多出一百多个小时——法国人的三十五小时工作制（第六章）是真金白银地少干活。法国赢在效率：每小时劳动产出明显更高；西班牙的问题仍是第六章说的「时间被切碎」，人在岗、产出平。

钱的购买力：西班牙的物价和房价整体比法国低两三成。一个巴黎中产搬去马德里，工资打折，生活质量可能反而升——这是过去几年真实发生的小规模迁移潮，远程办公之后还在加速。

主观感受：世界幸福报告这类排行榜上，两国常年挨着，法国略高几名，但都在「还行」区间，谁也没进北欧那种第一梯队。可见这两套日子各有痒处：法国人嫌税重、罢工烦、前途窄；西班牙人嫌工作不稳、工资低、政客吵。

那么，贯穿全书的问题怎么收？

回到第一章那个问题：一道不算高的山，凭什么隔出两种欧洲？

现在我们有了完整的剖面图。山只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：山隔出了「连通」与「隔离」；隔离的半岛被伊斯兰文明泡了八百年，又用八百年把国土一块块拼回来；拼出来的国家无法融化它的组件，于是有了四种语言、自治区、「人人有份的咖啡」和通向每个角落的高铁；连通的平原被迫早早锻成铁板，于是有了一种法语、凡尔赛、总统君主和从巴黎出发的星形铁路。连九点半的晚饭和十月十二日吵翻天的国庆，都能顺着这条链子一路推回那道山。

所以两种欧洲各自赢了什么？可以这么结这个账：**法国赢了「国家」，西班牙赢了「生活」**。法国把「组织起来」这件事做到了欧洲极致——最强大的国家机器、最完整的工业体系、最锋利的文化标准，代价是铁板太硬，每隔一阵就要当街敲一敲它（罢工和黄马甲是这块铁板的排热口）。西班牙把「过日子」这件事做到了欧洲极致——最长的寿命、最密的社交、最松弛的时钟，代价是拼缝太深，国家永远要花额外成本把自己缝在一起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两笔账正在互相渗透。法国人在讨论下放权力、改革工时；西班牙人在修工业、练国家能力。欧盟把两个经济体焊进同一个市场，申根协定让比利牛斯山口连边境检查站都拆了——今天你开车翻山，唯一的过境提示是路边一块蓝底黄星的小牌子。山还是那道山，但它隔出的两个答案，正在变成欧洲的两条互补的腿。

最后一个私人建议。如果你只去一个地方，就去**毕尔巴鄂到巴约讷那段边境**：山的西侧，巴斯克语的路牌先变成西班牙语、再变成法语，一小时车程里换了三个世界。站在山口往南看是高原，往北看是平原——两千年的故事，一眼就能望到头。这本书讲的所有东西，此刻都在你脚下。

一山之隔：法国与西班牙 · 王建硕